

一

凌晨1点,倪和平给王思蜀打电话,说欧阳健要自杀。

王思蜀吓得从床上坐起来,问:“怎么回事?”倪和平没力气解释,“让她明天来深圳,来了再说。”

王思蜀嘴里嘟囔:“这个项茹梅,作鬼!”

二

欧阳健是倪和平的初恋。

两人是重庆二中同学。二中は“贵族中学”,学生有两类,一类是欧阳健这样学习好的,另一类是倪和平那样家庭有背景的。他俩不是一类。1966年毕业,赶上“文革”,不高考了,大串联,把他们“串”在一起。

串联队伍是一支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,他俩是骨干。两人都识谱,但倪和平只识简谱,欧阳健则习惯用五线谱作曲,之后再翻译成简谱跟倪和平讨论。倪和平不得不刮目相看,身上的傲气减退一半。“长征”途中,二人经常于煤油灯下讨论曲谱,挨得近,彼此能感觉到对方身上的体温。

前几年“文革”歌曲回潮,倪和平给欧阳健打电话,说你听见了吧,现在歌舞厅流行的那个歌曲还是你当年谱曲的呢。

“那又怎么样?”欧阳健问。

“打官司呀,”倪和平说,“要叛税呀。”

欧阳健“喊”了一声。

串联的高潮是到北京接受伟大领袖接见,疯狂之后回到重庆,发现天翻地覆,倪和平的父亲已被揪斗。胸前挂个大牌子,“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倪振威”,名字上还打了红叉叉,像押赴刑场执行枪决的犯人。

倪和平顿时失去了所有光环,缩在家里不出来。欧阳健也不用自己写曲了。街上冒出许多革命歌曲,有些是土地革命时期的老歌,改动一下歌词,当新歌唱;有的是新写的,但具体谁写的不明确,一律是“集体作曲”。他也不拉小提琴了,小提琴资产阶级情调重,声音小,不适合伴奏革命歌曲。欧阳健改唱词,居然唱出了名气。保留节目是《赞歌》,前面的那一段“啊……”九曲十八弯,把听众带到离太阳很近的地方。

项茹梅是欧阳健的忠实“粉丝”。她低两届,年龄小,个子也小,跟欧阳健不在一个“档次”,出身也不一样。项茹梅是在坡坡屋长大的。重庆的坡坡屋相当于北方的大杂院,居住的大多是挑夫和纤夫。坡坡屋顾名思义,沿山坡搭建,地斜,屋顶也斜,随时要倒的样子。离码头不远,因此这里的孩子读书少,见识却不少。到项茹梅这一代,也能上学了,项茹梅接触到坡坡屋以外的孩子。他们不拖鼻涕,下雨天有红色绿色的小胶靴穿。哪像项茹梅,穿哥哥剩下的元宝口胶鞋,不好看,还

神秘电话

站台空寂下来,钢架顶棚以外的露天地还在下雨,银色的列车即将滑动。五号车厢门口,大盖帽、配着对讲耳麦的列车长示意几次了,车窗里那些目光闪烁闪烁。

“你不会不要我了吧?”她仰脸望着我说,两臂紧紧箍着我。

我摇头。

“你要取那样,我就用鼓槌把你揍趴下,再伺候你。”

我点头。

“我真得上车了。”

她不松手。

“快来不及了。”

“那更好,咱们一块儿回学校。”

列车长喊起来,我挣脱了她,跑过去。

我们在车上下车挥手,直到看不见对方。

我叫林晓,此刻正在北京开往东北的时速200多公里的D字头动车上,带着一个打鼓女孩的香气。

她叫眉眉,我的第三任女友(不想再有第四任了),身材介于骨感和肉感之间,红狐狸色长发绺起或披散着都一样漂亮。爹妈给了她比夜色还黑的一头美发,她非得再额外花上他们一笔钱,用红狐狸色把那样好的黑色罩住(此前是苹果绿色,再往前是麦草黄色)。

她在酒吧打架子鼓,在音乐厅打定音鼓,后者才是她的本行。她是燕京音乐学院管弦系打击乐专业的大四学生。

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三里屯的一家酒吧,当时她穿着银色的短衣短裤短靴,在小舞台上打架子鼓,我和几个搞音乐的朋友在一旁狂喝滥饮。我们曾利用业余时间为一家人演艺公司打工,赚了些钱,准备挥霍掉一部分。山崩地裂的摇滚音乐中,我的目光完全被她套牢,她抡着鼓槌手脚并用猛击大鼓、小鼓、桶鼓、吊镲、踩镲、节奏镲的样子性感极了。后来我才知道,大家是同一所大学的校友,还是东北老乡,她家在辽东半岛,已经挺像京片子的口音里偶尔会冒出一点海蛎子味。我们好上以后,只要周末晚上她在酒吧有活儿,我差不多都会一陪到底,用飞吻、带头鼓掌、外卖肯德基、冰块哗哗作响的大杯可乐、夜北京街头充满爱意的漫步,犒劳我的女神。

但她的姓氏有些生僻,姓九,我最初听说这个打鼓女孩叫亢眉眉时,心里有一种奇怪的感觉。

晚上,我爸听我说到她的姓氏,表情也奇怪起来。

我爸林一木,生于1955年,身材高大,背部微驼,平生最大野心是成为音乐家。他的野心基本实现了,只是缺少几个“硬件”:音乐学院毕业,官方音乐机构领工资,在册在编。但我仍然认为他是很棒的体制外音乐家,只是错误地生在凡事需要“硬件”的现代而不是古代。

我爸32岁才得的我,他差一点就得不到我



内容简介:

今年是深圳特区成立40周年,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惑之年。作者经历丰富,见证了深圳这座城市的发展繁荣,并将许多真实事例写成了一系列“深圳故事”。相互关联又独立成章的五个故事,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独特侧面。特区的腾飞故事,也是特区开拓者的命运故事,作者写就这本《深圳故事》,以此作为对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的文学记忆。

经常灌水。

“文革”前夕,项茹梅得益于“就近入学”的新政策,也升入二中。但他们一看就与老二中的学生不同。幸好“文革”爆发,抹平了二者的界限。老生成立战斗队,新生不甘落后,也成立战斗队,并且新生来自五湖四海,更有战斗力,成为急先锋。

项茹梅是在欧阳健的《赞歌》声中冷静下来的。她发现世界上还有比“造反”更美好的东西。比如《赞歌》,比如欧阳健。她感觉欧阳健跟她哥哥不一样,跟坡坡屋所有的男人都一样。

毛主席发出最高指示,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,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,很有必要。”第一批上山下乡轮不到项茹梅,但她看到光荣榜中有“欧阳健”,也去报名,坚决要求上山下乡。

那天项茹梅早早上了车。她不像别的学生跟父母依依不舍,她只想跟欧阳健在一起。

项茹梅坐到最后一排。她想象高大的欧阳健应该坐在这排。她知道欧阳健不认识她,但只要坐到一起,总会有机会说话。伟大领袖好呀,项茹梅想,要是没有伟大领袖的最高指示,她不可能跟欧阳健坐到一起。

大部分同学都上车了,欧阳健还没露面。难道他不上这辆车?或者因为什么原因不去了?不

文 摘

南橋北枳

会呀,名单上写得清清楚楚,还能错?万一呢?万一欧阳健真的因为什么特殊的原因不去了,我是不是也不去了?不去行吗?

欧阳健终于出现。

欧阳健是名人,谁都认识,一路过来不断跟人打招呼。

车上只剩下最后一排两个空位,正好在项茹梅两边。

欧阳健上车。一面跟大家打招呼,一面往后看,往项茹梅这里看。看得项茹梅顿时感觉心脏扑通扑通直跳。

欧阳健开始往里面移动。手里有一个包和一个黑色的匣子,其他行李肯定放到车顶上去了。项茹梅知道那匣子里面是小提琴。欧阳健就这样一手提着包一手举着小提琴往里面移动,只要再走几步就到达最后一排了,只要到达最后一排,欧阳健就会在项茹梅旁边坐下,他们彼此一打招呼,就算正式认识了。

“欧阳,这里。”

突然,一个声音划破了车厢。欧阳健回头,向车厢前面走去。

项茹梅这才发现,坐在第一排的那个披着军大衣的人已经回过头来,举一张灿烂的笑脸迎着欧阳健。这是一张女人的脸,刚才项茹梅根本就没注意到这个女的旁边还有一个空座,空座上放着一个箱子一样的东西。现在,她把箱子搬起来,原来是一个手风琴。她把手风琴抱在自己腿上,将空位腾给欧阳健。不用问,她是有意给欧阳健占位的。

狐狸精!

项茹梅心里狠狠骂了一句。

三

车队在鞭炮和锣鼓声中启动。项茹梅听见有人喊她的小名。“小梅子,小梅子!”她没回答,也没抬头。项茹梅不喜欢父母当着这么多同学的面喊她的小名。幸亏这一车子的同学都比她高两届,没人认识她,也没有人知道车下老两口是喊她的。

在此后的行程中,欧阳健后脑勺总是在她面前晃。尤其可恨的是那狐狸精,跟欧阳健贴得那么近,两人一直在悄悄说什么。能说什么好话?

车子终于停下。全体下车,先上厕所,然后听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说话。说这里是前进人民公社,一部分人就在这里插队,其余的人继续往前。念到名字的人留下,其他人回车上。

名字念完了,有项茹梅,但没有欧阳健。欧阳健

跟留下的同学打招呼,还跟几个同学握手拍肩膀。

大家争先恐后欢喜若狂的样子给领队一个假象,以为点到名的肯定留下了,谁也没有注意到项茹梅被念到名字却又回到车上。

汽车又在土路上走了一个多小时,终于彻底停下来,因为前面已经无路可走。一座大山挡住了去路。这里就是离重庆最远的公社,居然起了一个革命圣地的名字,叫“延安人民公社”。

吃过饭又开始念名单。二十多人分配在三个生产大队。名单念完了,没有项茹梅。

项茹梅往欧阳健那一组挤,很快就被清理出来。

项茹梅所能做的就是争取留在“延安人民公社”,和欧阳健在一个公社。她对领队说:自己要到最艰苦的地方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。这里比前进公社离重庆更远,更艰苦,她坚决要求留下。

她留了下来,被分配到最远的下勘大队。

延安公社共有三个大队,南勘、北勘和下勘。

三个大队从南、北、东三个方向围着大山。大山是一条长长的山脉。山脉从西面连绵过来,尾巴末梢是下勘,再往东就是湖北了。

一转眼,下乡三个月了。项茹梅不娇生惯养,翻茶叶地也没觉得多么吃力。月底评工分,其他女知青6分,她年龄最小,却评了8分。

主要是劳动态度好。项茹梅干活从来不叫苦,三个月里她一次都没有请假。生产队没有星期天,谁有事跟队长打个招呼,不记工分就行了。其他知青一到星期天就请假,项茹梅没有,老乡们认为她劳动态度最好,最能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。

其实,项茹梅根本没地方去。其他知青都有同学在南勘或北勘,项茹梅比他们低两届,一个熟人没有,不如出工挣工分。工分虽不值钱,但好过没有。项茹梅是坡坡屋出来的,晓得钱金贵。

项茹梅也想去北勘,却找不到理由。如果欧阳健在南勘,在公社的所在地,项茹梅就有理由去了。

星期天,又有两个知青请假。项茹梅问他们去哪里,如果他们去北勘,项茹梅就假装好奇跟他们一起去,但他们说去公社,还问项茹梅去不去。项茹梅摇头,说不去。

当天晚上项茹梅就后悔了。因为他们回来时,在公社碰到了欧阳健。

项茹梅星期天也开始请假,理由是去公社。也确实去公社,目的只有她自己知道。但一连几次,去的时候雄赳赳气昂昂,回来却发现这20里地特别长。

终于有一天,项茹梅在南勘见到了欧阳健!

她不敢认,欧阳健比以前黑多了。擦肩而过之后,项茹梅转身盯着欧阳健后脑勺。欧阳健的后脑勺变化不大,还基本保持来的时候在长途车上的样子。项茹梅确认后,激动地一喊:“欧阳健!”

因为很激动,所以声音比较大,欧阳健几乎被吓了一跳,回头问:“你是……”



内容简介:

《把我的世界给你》为纪念恢复高考40年特别奉献。本书讲述了音乐学院研究生林晓探家时获悉,与之热恋的女友之父,竟是当年陪父亲林一木于绝境的高考密者。改革开放初期恢复高考时,青工林一木考入绿江大学。一封匿名信密告他无资格就读,噩梦由此开始,他被校方除名。在众多师生可歌可泣、别具一格的援助下,他以屈辱的无学籍的“黑生”名分完成剩余学业。30多年后,新一代学子林晓的恋情,仍被历史阴影所笼罩。

太好了。

绿江大学曾是创立于20世纪50年代初的俄文专修学校,校部主楼、图书馆、文科大楼、数理化大楼等沿街的建筑都是苏联专家设计的,门脸儿的中心顶点旗杆下一律是浮雕的五星,有的红色,有的与建筑同灰,周边环绕着镰刀锤子麦穗。灰白色文科大楼在所有建筑中是最漂亮的,正门前典雅轩敞的雕花石柱雨搭,把守两端的圆形古堡式楼角,精致的门窗,柔和的弧形窗顶,颇长的玻璃,都有一种高贵沉静的美。

从学校正门进去向西直行,可经过文科大楼和图书馆,通道两旁多年乔木的硕大树冠纵横相连,遮天蔽日。文科大楼近边还有好多三四层楼高的松树、槐树、榆树、柳树、银杏树。我爸就读的中文系在文科大楼最高层,三楼,把经济系、哲学系和历史系都踩在脚下。

窗外树影婆娑,窗内书香袭人,在一片蓝、灰、绿色学生制服(里面是白衬衫)和白色学生校徽的海洋里,他用余光抚摸着自己左胸兜上那枚白色校徽,时常觉得在做美梦,担心会突然醒来。

我爸的故事应当从那个神秘的电话讲起。

那天早上天很冷,北里的窗玻璃都起雾了,我爸裹在厚厚的被子下睡得正香。枕边一定有

“我也是二中的,”项茹梅说,“初中部的项茹梅。和你坐一个车来的。”

“哦,对了,项茹梅,你在下勘,名字听说过,人没有对上号。”

“你听说过我吗?”

“是啊,”欧阳健说,“上个月也是在这里,碰到你们下勘的几个同学,他们说下勘一共7个人,说了6个我都认识,就‘项茹梅’不认识,原来是你呀。”

“那是你架子大,我在学校就认识你了。”

“是吗?”

“是啊。我最喜欢听你唱的《赞歌》。我还会拉小提琴。”

“你也喜欢文艺?”欧阳健问。

项茹梅不置可否,打岔问:“你是怎么来的?”“坐11路呀。”

“11路?”

“就是走路啊。”欧阳健说着,还抬抬腿,做了一个步行的样子,然后问,“你是怎么来的?”

“我们队正好有拖拉机来。”项茹梅说,“要不然你跟我们拖拉机回去,去我们那里玩玩呗。”

欧阳健没有立刻答复,他看看自己身边的一位,像是在征求她的意见。

项茹梅这才注意到,欧阳健旁边还有一个人,就是那个“狐狸精”,尽管此时项茹梅恨不能给她一脚,但还是假装热情地上去挽住倪和平的手,说:“去吧,去玩玩吧。反正坐拖拉机。”仿佛她跟倪和平早就是老朋友。

在下勘,欧阳健他们受到热烈欢迎。几个知青过年。无奈这地方太偏僻,消费水平极低,平常村里面的小卖部的主要作用是老乡用鸡蛋换盐,连吃点酱油都是奢侈,哪里有什么好招待的?项茹梅找出一块腊肉,瘦肉部分早吃完,剩下连着猪肠子的肚皮,想扔掉又舍不得,一直放着,都放成古铜色,没想到当天成了主菜。

项茹梅心疼欧阳健,就像母亲心疼她父亲,他们家穷,但是再穷,父亲放木排回来,母亲就是借也能借两个鸡蛋回来,给父亲弄二两酒两个菜。当初母亲专门给父亲炒鸡蛋的时候,项茹梅还有情绪,现在突然理解了。好在项茹梅平常节省,身上有一些钱,早早从小卖部花七毛三分钱打了一斤红薯干酒,又拿自己积攒的肥皂找老乡换了10个鸡蛋。

那是他们下乡以来最开心的一天。一斤白酒和半刀腊肉整得下勘满村飘香,连狗都围来凑热闹。

欧阳健向大家透露,公社准备成立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啦。大家欢呼雀跃。这意味着他们可以经常聚在一起。

大家又说到重庆名吃。欧阳健说自己最喜欢吃二娃子扒肥肠,听得大家满嘴生津。

(摘自《深圳故事》,丁力著,作家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)

本书,这习惯我今天还保留着。

我奶奶不忍心叫醒她的小儿子。他每天用功到深夜,星期天不多睡会儿还啥时候能睡呢?但电话里的口气挺急,还是得叫醒他。

30多年后,一个人在家里接电话太寻常了,可30多年前这样的事情就不太寻常。是的,我爷爷家有电话,公家为他安的。我爷爷是本市党报的一号首长,每天都要用电话谈报纸的事情。当年这座城市里的电话还不多,号码仅五位数,我爷爷家的是24463,章玮叔叔喜欢用音乐简谱的方式念成“来发发拉米”。

那个深秋的早上,“来发发拉米”被什么人拨响了,我爸从被窝里钻出来,下了地,睡眼惺忪地去了客厅。他打了个喷嚏,我奶奶为他披上一件衣裳。

电话是我爸技校时代的班主任打来的,我爸这下完全清醒了,亢奋地向他打听农机厂的情况,用车轱辘话反复诉说着对厂子的怀念。班主任也问了问我爸的读书情况。一会儿他压低声音说:“大林,有件事……”

“有什么事您尽管吩咐,”我爸说,“只要能办到,我头拱地也给您办。”

“有一封信。”

“您可别鼓励我早恋啊。”我爸打哈哈说。他们年龄差距不大,技校时期关系就像兄弟。这个厚道的黑汉子作风民主,对我爸又太赏识了,我爸私下里跟他讲话就有点没大没小。

班主任异乎寻常地严肃起来,说:“别逗了大林,是封匿名信。”

“匿名信?”

“有人告你技校毕业不到两年就考大学,市招生的办人都来了,昨天我去厂办大楼时听说的。你赶紧想想办法吧!”

话筒里响起嘟嘟的忙音。

我爸望着客厅书柜上那台老式的黑色拨盘电话,半天没动弹。

那是10月的最后一个周日。上午,我奶奶家依照多年的习惯,全家人赶在冬季来临前聚在一起,把几十棵晾在楼外的大白菜一棵一棵收拾好,洗干净,装进缸里渍酸菜。那口缸够大的了,缸口直径近一米,但要把拾掇得嫩绿洁净的大白菜都装进去,也不那么容易,须从缸底一棵棵码好,塞严,不留缝隙。缸底先要撒上一些用来杀菌的大粒盐,然后铺一层菜,撒一些盐。铺到大半时,还得有人进缸里用力往下踩,这样就可以多装进几棵,使漫长的冬季里有更多酸菜可吃。

中午,全家人围坐在小餐厅里,吃着热气腾腾的菜包子,我爷爷还喝了一盅白酒。我爸没吃几个就握了筷子,我奶奶偏爱她最小的儿子,催他再吃几个,他抬屁股走了。

他二姑在他身后说:“咱家包子没他们大学的好吃。”

我爸把通往客厅的门狠狠摔上,磨破玻璃碎了满地。

(摘自《把我的世界给你》,刘嘉陵著,作家出版社2018年6月出版)